

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 看貝克的「第二現代」^{*}

胡正光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mail: huchekua@hotmail.com

摘要

由「風險社會」開始，到近年來標榜的「第二現代」，貝克已是目前德國社會學界的明星，匯聚了相當數量的學者在共同的口號之下集結各自的研究成果。本文有興趣的則是貝克的理論架構，把他與之前重要的德國社會學家之理性化批判連結起來，從批判科學理性的角度，來看他把當代社會比喻為不確定性的社會是否恰當。本文的結論認為，若把「風險」完全歸咎於工具理性的失敗，並且用「反思意識」的有無來界定新時代則未免牽強。但另一方面來說，融合後現代理論觀點的「第二現代」則是德國社會學對於如何抑制工具理性獨大最積極的嘗試之一，在規範策略上則傾向了韋伯的建議，並擺脫了韋伯對人類命運的悲觀看法。

關鍵詞：貝克、風險社會、第二現代、理性化、次政治

投稿日期：94.12.19；接受刊登日期：96.6.14；最後修訂日期：96.6.4

責任校對：陳雪美、李俊達、李珮華

* 本文於寫作期間，獲得國科會人文處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提供經費補助及資料上的協助，特此申謝；此外也要感謝兩位審查人細心的指正。

壹、前言

戰後出生的德國社會學家當中，貝克 (Ulrich Beck) 可說是目前最引領風騷的人物了，他和英國的紀登士 (Anthony Giddens)、瑞旭 (Scott Lash) 共同標榜的「第二現代」(Die Zweite Moderne) 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後，匯聚了更多的學者，漸成一個集體的學術潮流。屬於這個潮流的理論家們試圖在「現代」與「後現代」的爭論之間，找出「第三條路」(劉維公，2001: 1-6)。因此，貝克的理論不僅只代表他個人的學術見解，某種程度上他也是德國社會學界的主流聲音之一。若說貝克是繼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盧曼 (Niklas Luhmann) 之後最具國際聲望的德國社會學家，亦不為過。

不過，雖然是在共同的旗幟下，但「第二現代」並沒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 (劉維公，2001: 2)，無法在短短的一篇論文中概括整個「第二現代」的討論，只能選擇其中一個方向。本文之目的，在於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檢視貝克理論的結構，因為貝克的原始出發點——「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帶有很強的科學理性批判味道，而工具理性問題在德國社會學的傳統中一直是個無法令人忽視的主題：由韋伯 (Max Weber) 著名的「鐵牢籠」比喻，¹ 到古典批判理論 (die klassische Kritische Theorie) 的代表性著作——《啓蒙的辯證》(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Horkheimer & Adorno, 2002)，以及哈伯瑪斯的學術脈絡，莫不圍繞在這個核心的概念上打轉。貝克雖然沒有標示自己繼承這個路線，但從他疾呼要從科學專家手中拿回定義「風險」(Risiko) 的權力、「簡單的」科學化與「反思的」科學化之區分 (詳後文)，就可以看出來他也批判工具理

¹ 韋伯對於理性問題的關懷，是施路赫特 (Wolfgang Schluchter) 對韋伯作品的詮釋。請參見 Schluchter (1980); 施路赫特 (1986); 顧忠華 (1994)。

性的獨大，而最主要的攻擊點就是工業化風險的出現，「風險」正代表工具理性之「確定性」(Sicherheit) 承諾的失敗。然而，這個成功的工具理性批判卻在「風險」概念延伸到「個人主義化」(或稱「個性化」，Individualisierung) 的時候，使他的理論顯得不連貫。本文就從「風險」這個概念出發，看貝克如何把一個「公害社會學」擴大到一個全面性的社會理論，其中結構鬆散之處何在。

本文由五個主要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將略述「理性化」問題在德國社會學中的脈絡；第二部分則描繪貝克原始的風險社會命題，以及更進一步的「反思的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即「第二現代」——的大要；第三部分將歸納出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然後第四部分再提出貝克的規範性社會理論 (主要是「次政治」，Subpolitik)；之後本文將從三個方向：貝克的方法論立場、他的工具理性批判、反思的現代化等進行批判，來解析貝克理論結構的缺陷，最後並摘要做出結論。

貳、「理性化」問題的脈絡

二十世紀德國社會學追尋理性化難題的解決以貝克的反思性現代化做結束，而這個故事是從韋伯的歷史社會分析，也就是除魔化命題 (Entzauberungsthese) 開始。韋伯認為，現代的動力起初體現在一個宗教的信仰體系，隨著這個動力傳佈到社會制度中，它也因此獲得了正當性。西方的理性化帶來的後果是，人的生活都化約為效率，理性的生活指引受進步觀念操縱，宗教式的完美人生從此遙不可及。對韋伯來說，理性化難題有兩個方面：生活的意義不能從工具理性的作用來證明，因為精神的世界已經被可計算性 (Berechenbarkeit) 的邏輯化約到物質，所以無法提供意義；第二點，

西方理性主義雖已傳遍全球，它的普遍正當性並未得到確證。² 因此，在韋伯理性化的難題中，有兩個「價值理性」(wertrational) 的意涵：一是人如何能在宗教之外追尋生活的意義；³ 其次，如何證明理性化的普遍正當性 (Habermas, 1987: 252-253)? 這兩個韋伯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二十世紀德國社會學界理性化問題的開端。

在這段歷史中，很難證明這個主題存在著連貫的學術旨趣，因為從一開始，韋伯就沒有說明他的研究企圖，只有透過其他人的詮釋 (如 Siegfried Landshut、Friedrich H. Löwith、Karl Tenbruck、Wolfgang Schluchter、Wilhelm Hennis 等)，才將理性化問題當作韋伯的研究目標。第二個理由是，韋伯未能建立自己的學派 (Kaesler,

² 有關西方理性主義的正當性是否得到確證，由於韋伯作品脈絡中的矛盾性，學者之間的看法並不相同。爭執從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著名的開場白就出現：「身為歐洲現代文化之子，我們在研究世界史時，不可避免且有充分理由來提如下的問題：即在西方，而且唯有在西方，曾出現了一些文化現象，其發展方向——至少我們 (西方人) 樂於如此想像——具備了普遍、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意義和效果」(引顧忠華翻譯。顧忠華, 1994: 91-92)。這一句話便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哈伯瑪斯與施路赫特的強解釋，認為韋伯「肯定」西方理性主義的普遍性與正當性，因為不管西方人或東方人，一旦思索「現代」，必然且唯一的探究對象是西方理性主義，這是從實際面來肯定西方理性主義目前的存在與地位 (Habermas, 1987: 253-254)。但另外一種觀點認為，韋伯說「『我們喜歡認為』理性有普遍的有効性，看起來似乎暗認『那只是我們自己文化的興趣，去提出這個問題。』」亦即這個問題在西方之外，並沒有普遍性，因此這只能表明韋伯作品中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緊張，或許也是「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對立 (Dodd, 1999: 52-53)。本文在此採取後一種主張，認為韋伯的立場是「審慎懷疑」，無法明確證明西方理性主義的正當性。

³ 這個價值理性的問題出自韋伯的兩篇講詞——〈科學做為職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Weber, 1988: 582-613) 與〈政治做為職業〉(*Politik als Beruf*) (Weber, 1980: 505-560)。論證則出自施路赫特的命題，即韋伯想發展出一個「價值理論」(Endreß, 1998: 35)，因為韋伯的「職業」(Beruf) 一詞有宗教意涵：得到神召喚的信徒，將在工作中體現他們此生的任務。

1998: 255-256)，所以對他的詮釋可能是錯誤的。受韋伯影響的帕森思 (Talcott Parsons) 傳統就不遵循理性化的路線，而是嘗試建構一般性理論。

另一方面，古典批判理論繼承理性化路線多少出於偶然，因為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起初想從唯物論觀點解釋無產階級革命為何沒有發生 (Honneth, 1989: 12-14)。⁴ 藉由「物化」(Verdinglichung) 的概念，兩大古典理論家 (馬克思與韋伯) 才結合在一起。古典法蘭克福學派之理性批判的基礎觀念就在《啓蒙的辯證》；在這部作品中，霍克海默與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 原來只想分析晚期資本主義 (或國家資本主義) 的新近發展，但他們的命題因工具理性批判而和理性化過程連上關係。

在《啓蒙的辯證》裡展開的工具理性批判將理性化的分析推到了最低點，亦即文明的過程從一開始就是個衰亡的過程 (Horkheimer & Adorno, 2002)，韋伯所持的懷疑態度在古典批判理論轉化為極端悲觀。西方理性主義的普遍效力要求無疑地被霍克海

⁴ 古典批判理論的理性批判雖與韋伯的「理性化」命題有強烈的共通之處，但兩種傳統對於「理性」卻有不同的認識：韋伯以「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 表示手段與目的之一致性，純粹出於「可計算性」的觀點來定義理性 (Rationalität)；霍克海默將韋伯的「目的理性」用「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 Vernunft) 稱呼，表明「目的理性」行動在現代社會之工具性格 (顧忠華, 1994: 14)。比較有意義的術語轉換顯示在「理性」一字的選擇：韋伯用 "Rationalität" 這個拉丁字，表明「理性」之可計算的特質，但霍克海默卻偏好用帶有黑格爾意味的 "Vernunft"，象徵理性也有道德批判的意涵。這種理性不僅在於對事物發生做原因、推理的認識，還有「價值」的認識在內 (Schischkof, 1991: 755-756)。換言之，韋伯那種分割「實然」與「應然」的新康德主義立場，受到古典批判理論主張的「知識」與「目的」統一、「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統一所揚棄 (Bottomore, 2002: 29)，「理性」因此是一個有價值意涵的概念，而非如韋伯所想的可以存在價值中立的「目的理性」。而且正因為把理性窄化成工具性 (目的理性) 的使用，所以文化、宗教、藝術領域在現代社會喪失了理性的另一層意義：價值的批判 (顧忠華, 1994: 15)。

默和阿多諾否決，工具理性終將奴役人類，而全面解放的可能性也消失在古典批判理論中。

藉由一個複數的理性概念，⁵ 哈伯瑪斯建構了轉捩點，可以把理性不對稱的發展加以平衡（至少他這樣認為）。⁶ 在所有處理理性化問題的理論中，哈伯瑪斯的理性重建計畫顯得最具意義。若沒有他，就很難顯示出自韋伯以來的理性化命題之歷史有意義上的連貫。哈伯瑪斯將不同的社會學傳統結合：韋伯、西方馬克思主義、米德 (George H. Mead)、涂爾幹 (Émile Durkheim)、帕森思、然後回到馬克思，以便為批判理論建立一個規範的基礎。若說「理性化」在戰後的德國社會學是一個重要題目，哈伯瑪斯無疑扮演決定性角色 (Hu, 2004: 160-162)。

在二十世紀末，貝克帶著他的「風險社會」登上了舞台。從當中，我們可以發現有關工具理性批判的命題，也就是以下的主題。

參、「風險社會」與「反思的現代化」

一、「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現代工業社會的特色不只是科技的進步，還必須考慮這些進步的副作用——也就是工業的危害，例如危及到人類生存的生態危機。這些危害在開始時不是無法避免的，但事前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它們，所以沒有預防。貝克用「風險」來證明科技進步

⁵ 指工具理性與溝通理性 (kommunikative Vernunft)。

⁶ 哈伯瑪斯雖然屬於批判理論的一員，對於理性化問題的看法顯然也與他的學派前輩不同，這顯示在他對於「理性」的態度。哈伯瑪斯顯然對科學不抱持全盤的敵意，反而認為哲學必須將它負擔關連世界整體、將知識「整體化」(totalizing) 的任務交到社會學理論的手中，於是黑格爾式的「理性」(Vernunft) 又慢慢回復到康德式的「理性」(Rationalität) (Bottomore, 2002: 77)。

所可能帶來的危害，這個概念並不限於使用在科技帶來的環境危機，還延伸到社會制度的領域，也就是「個人主義化」命題。

(一) 風險概念、風險邏輯、風險社會

「風險」並非現代人的發明，但工業社會的風險必須與前工業社會的風險做區分。在前工業時代，「風險」常指個人勇氣或冒險的代價，與個人行動有關，今日的法卻帶有毀滅生命的味道 (Beck, 1986: 28)。今日風險的起源是生產力的過度發展，而其實生產力的發展原本是為了解決物質上的匱乏。現代生產力的發展最後卻在全球層面上帶來了負面效果，例如有毒物質的散佈，其在水中、空氣中、食物中的危害潛能對前工業社會的人來說，既前所未聞、無法想像、也不可能做到。

風險可能危害生命的意識在進步社會能夠成為優先的議題，基本上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真正的物質需求客觀上已經降低，且在社會上受到限制，因為個人與科技的生產力、法治與社會主義國家的保障、規範都已達到一定水準；其二，風險與人類自我威脅的潛能隨著生產力等比級數的增加，也以前所未聞的規模釋放出來。這兩個條件改變了社會分配的邏輯：由匱乏社會中的財富分配邏輯轉為已開發社會的風險分配邏輯 (Beck, 1986: 25)。

貝克進一步提出了「風險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五項區分命題 (Beck, 1986: 29-31)：第一，「風險釋放了由系統制約的、通常是不可逆的損害。而風險多半是不可見的，由 (科技知識的) 因果解釋生產出來，可以在知識中被更改、降低或升高，也可以很戲劇化，或是變得無害。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對社會定義過程開放。」因此，在定義風險時，媒體與社會地位佔有社會政治的關鍵位置。從這裡，我們發現貝克將風險視為社會建構的，唯有這樣才能把工具理性套上韁繩。

第二，風險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再由階層或階級來決定。掌握財富、權勢不能保證安全，因為風險分配不是可絕對精確計算，也不能精確預測，危害的狀況對所有人都一樣。

第三個命題則和經濟面相關：現代化風險沒有止盡的一天，所以市場需求也無止盡。原因是，科技生產不斷帶來新危害，所以要藉助新科技化解這些危害，對新科技的需求正是經濟利潤的泉源之一。

第四個命題討論風險意識：人可以追求財富，但風險是自己找上門。為了避免可能的危害，我們必須有意識地認知風險。貝克因此宣稱，知識有了政治上的意義，風險社會的政治潛能必須在社會學中，以及一個有關風險知識出現、傳佈的理論中開展與分析。

最後一個命題是，被社會所承認的風險本質上是政治的點火劑：原本非政治性的，會變成政治事件。貝克稱這個現象是「災難的政治潛能」(das politische Potential von Katastrophen) (Beck, 1986: 31)。

而從這五個命題，我們又可以抽離出兩點做討論。首先是風險與科學的關係：按貝克的說法，現代風險與工業化同時出現，所以也依賴現代知識。一方面，現代科技在全球的層面上引發大規模對生命的危害；另一方面，風險是透過數學的計算（亦即或然率）而被認知。對同一風險會有多種或然率解釋，然而實際發生的工業意外使得貝克認為，風險其實是不可精確計算、不可準確預見的，這將使人無法相信現代科技，導致「信任的喪失」(Vertrauensverlust) (Beck, 1986: 35-37; 1988: 21)。

第二是現代化風險的社會面向：危險管理 (Gefahrenverwaltung) 不是純粹的科學事務，它將做為現代生活的一部分，在社會的政治過程中制度化。因此我們必須把風險定義的政治效應也列入考慮，

因為社會與法律的責任不能單獨由不確定的數學因果臆測（指或然率計算）來決定。貝克強調，在風險的確定過程中，倫理、哲學、文化已從經濟、自然科學的支配下重新復活。我們已經被喚醒，要有系統、有組織地定義風險情境。這對貝克來說是一個信號，亦即科學在定義風險時的理性壟斷必須被打破，社會應從科學討回自己的理性 (Beck, 1986: 36-38)。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貝克擬出了一個工具理性批判的草圖。他區分了科學與社會的理性，後者可能是個重要的規範社會學開端，可惜他並沒有繼續解釋這個概念。風險分析標示著貝克對現代的病理學診斷，風險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是一個社會規範理論的起點，嘗試著解決現代社會的困境。不過若是把「風險」侷限於生態問題，頂多也只是一種「工害社會學」，不是一個全面性的大理論。貝克的下一步就是把「風險」的概念延伸到社會的其他領域，證明「風險」在今日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以便用「風險社會」替代我們所熟悉的「階級社會」，亦即造成「典範的轉移」(Paradigmenwechsel)。

(二) 「個人主義化」——風險概念的擴大

在《風險社會》(*Risikogesellschaft*) 裡，貝克把風險的概念擴展到社會的其他制度面，他宣稱十九世紀社會學古典理論家所描述的「傳統」工業社會生活形式已經過時，當代進步社會中的生活形式已經不再受階級或階層歸屬的制約。由於社會流動（正確地說，是上升流動）、高等教育普及，核心家庭已經瓦解，個人在更大的自由中塑造自己的生活，但同時社會規範系統對確定性的承諾也已經失效：大量失業、新的貧窮問題出現，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而不是由階級或階層決定 (Beck, 1986: 121-160)。

個人主義化不代表原子化 (Atomisierung)、個別化 (Vereinzelung)、孤獨化 (Vereinsamung) 或社會的終結。「個人主義化」是工業社會形式的「瓦解」，然後「交替」：個人從階級解放，不再經過一定的歷程，可以自由塑造自己的生活。在西方工業國家，個人主義化的過程意味著由核心家庭、性別角色、婚姻等組成的階級不再確定個人的集體生活形式。結果是，個人的生命歷程不再是單線的：人可以決定自己要受什麼教育、轉換工作、加入喜愛的團體、更換生活伴侶 (Beck, 1993: 149-151)。換言之，個人從大群體脫離出來，從前受階級或階層制約，而不需多思考的生活方式減低了約束力，造成日常生活的「解例行化」(Entroutinisierung) 現象，固然個人的行動自由增加，但也面臨更多人生的選擇與決定，因而也更暴露在風險之中，生涯固然有更多「自己動手做」(Bastelbiographie) 的成分，相對來說，也是一種「風險生涯史」(Risikobiographie) (孫治本，2001: 105-106)。循著這個論證，在進步社會中的人正處於一個風險的情況中，他們不只受科學技術風險的威脅，生命歷程同樣充滿不確定性。

二、反思的現代化——「第二現代」

分配邏輯的改變是貝克有關已開發社會（他以「風險社會」或「第二現代」稱之）的理論基礎，風險社會的特質將歸納如下：

首先，如前所述，風險社會不是物質匱乏的社會，風險分配已經取代財富分配成為社會正義領域的第一優先原則。

其次，風險不是已發生的後果或損害，它是現在可預見的、尚未發生但有威脅性的破壞。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在今日不是真實的，換句話說，風險是投射在未來的危險。風險社會因此也不是現在取向的 (gegenwartsorientiert)，傳統與過去都失去它們的支配意

義 (Beck, 1986: 43-45)。

第三點則有關風險社會的普遍傾向。貝克相信，現代風險已經在全球層次上威脅人類文明。風險全球化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車諾比 (Tschernobyl) 一九八六年的核電廠事故。工業風險的傳佈意味著全球化的討論不應只集中在經濟、文化的結果上，我們也必須思考工業化的生態後果。現代化風險使得不同的價值往中間匯聚——因為對災難的恐懼。對紀登士與貝克來說，一個普遍主義直接從我們的經驗產生，而不是出自理論性的規範基礎 (Dodd, 1999: 197, 216)。

最後一點是理性的作用：對貝克來說，理性不再只是扮演人類歷史進化的推力，反而在風險社會（或稱「第二現代」）提供了反思的能力。在風險社會的命題中，風險意識標示了工業社會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不只工業化的進步，還有這些進步帶來的副作用都被我們辨識出來。這些副作用並非現在才有，毋寧是因為在工業化開始時，危害的潛能與規模都較小。而到現在才意識到它們的存在，是因為直到最近幾十年我們才有餘力思索工業化帶來的整個後果。所以貝克宣稱，在危險的處境中，意識決定存在，而非存在決定意識 (Beck, 1986: 31)。

如此，風險社會也是反思的現代 (reflexive Moderne)。因為現代化風險無預期地出現，貝克將第二現代又稱做「副作用的社會」 (Gesellschaft der Nebenfolgen)。本文對這個「副作用的社會」之概念深感興趣，因為依貝克的命題，科學與技術的理性不能保證人類歷史的正面發展，反而由於無法駕馭的工具理性可能會毀滅我們的物質世界，所以危及了我們的文明。這個文明危機的命題和貝克之前的德國社會學家的危機命題都不同：從韋伯、古典批判理論到哈伯瑪斯都認為現代的危機其實是一個人性的危機，貝克卻直接攻擊

工具理性的弱點，這個立場其實比較接近後現代理論家，因此在稍後將更仔細地討論。

肆、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

在《風險社會》裡，貝克論證道，因為工業社會的危險狀態，現代科學進入了一個反思的時代。他的論證可以歸結為四點，當作是他的工具理性批判 (Beck, 1986: 254-299)。

第一，「簡單」(einfach) 與「反思」(reflexiv) 科學化階段的區分在風險社會中是重要的；前一個階段的發展邏輯是一個「折半」(halbiert) 的科學化，科學理性對知識的要求仍排除對自身方法應用的質疑；在第二階段的發展邏輯是「全然的科學化」(Durchwissenschaftlichung)，擴大質疑科學自己內在的基礎與外部的結果，貝克稱這是「真理與啓蒙要求的除魔化」(Entzauberung des Wahrheits-und Aufklärungsanspruchs) (Beck, 1986: 254-256)。「簡單的」科學化意指相信進步的牛頓式、啓蒙式的科學，亦即霍克海默所稱的「傳統理論」(Honneth, 1989: 12-14)。但這兩種科學化的區分不能做為一個新科學形式的起點，因為在貝克稍後的作品中，我們沒見到新式科學理論發展邏輯的藍圖。這個區分只表現了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它的意義是，在反思的現代化時期，工具理性所許諾的「進步」已經不再有保證了，因此科學的理性也不能代表唯一的理性。

第二，兩種科學化的區分使得現代科學的「理性壟斷」被打破了，科學在反思的現代化中不能獨占知識的生產。貝克宣稱，反思的科學化開啓了科學生產與應用過程中，新影響與發展的可能性 (Beck, 1986: 256-257)，補充的理性概念叫做「社會理性」(soziale Rationalität)。但貝克對於「社會理性」卻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反而

是作用於科學之內與之外的「反思性」(Reflexivität) 概念，在他理論有中心地位。換句話說，「反思性」相當程度上是個理性的概念，作用於科學與社會的脈絡中。「反思性」因此可能是較高層次的理性，高於工具理性。從這個意義上，貝克隱約發展出一個理性概念，這概念應可駕馭工具理性。

第三，在反思的現代化中，科學的角色不再是禁忌的破壞者 (Tabu-Brecher)——將世界圖像由魔法中解放出來——而是禁忌的建構者 (Tabu-Konstrukteur)，因為在尋找風險的原因時，將會有政治經濟的效應，因此風險研究的結果本身就是風險。風險的因果論證 (即研究成果) 將因為「無法改變的」、「事實強制」、「系統強制」、「自身動力」等假設，使得自己成為「無法改變」的，以尋求「不可避免」的接受理由。也就是說，科學將自己變成禁忌 (Selbsttabuisierung)，科技文明將自己變成「禁忌社會」(Beck, 1986: 257, 280-282)。

第四，科學理性的基礎將因為自我的禁忌化而遭到質疑，啓蒙的計畫也將因為新禁忌的出現而結束，科技文明建造了另一種魔術式的世界圖像 (Beck, 1986: 258)。貝克在《解藥》(*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與《政治的發明》(*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繼續批判科學理性，他的主要論證建立在不完整的科學化，以及工具理性的可計算性之缺陷上。

在《解藥》中，貝克攻擊了工業社會之危險狀態的組織性特徵，他稱之為「組織性的不負責」(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風險不一定威脅某些特定族群，而是普遍分佈 (雖不一定平均分佈，許多時候有地區差異)。但界定風險時，科學專家獨攬大權，加上風險的製造必然有一定的政治過程，於是政策只出於單方面 (即專家) 提供的意見決定，並由政治部門加以

合法化，沒有可能的受害者（即社會大眾）共同參與。再者，現代社會的系統分化及相互依賴，沒有單一決策者決定一切。一旦災難造成，並不會有法律方面的問題，因為沒有人可以全權決定，沒有確切的責任對象，所以風險的製造一切合法（Beck, 1986: 43-44）。這種風險生產的法律特性貝克也用另一個術語——「危險的正常化」（Gefahrennormalisierung）——來稱呼（Beck, 1988: 123）。

在《政治的發明》中，貝克則攻擊工具理性的「未知性」（Ungewißheit）。從現代化的風險為起點，貝克論證道，風險社會中，理性的直線成長遇到了界線（Beck, 1993: 45）。他如此批判風險的數學式可計算性：

風險利用數學誇耀、自負，但它只是純粹的或然率，什麼也沒有排除。風險陳述有雙重的意義：我們可以拿出趨近零的風險機率趕走批評者，當發生了災難時，再抱怨公眾的愚蠢，誤解了或然率。風險可無盡地增加，因為它們用「決定」複製自己，而在多元社會中，人可以且必須評斷「決定」。（Beck, 1993: 47-48）

在不確定、不可控制、未可知的狀態下，貝克宣稱：「在風險問題中，沒人是專家，或所有人都是專家。」因此，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基本上攻擊科技的擴張與提升，竟然背離了原來的目的（Beck, 1993: 48）。

貝克的命題或許是德國社會學的理性化問題脈絡中，對工具理性最強的攻擊。韋伯懷疑，工具理性的提升是否真能使人的生活指引走向理性；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用否定的批判回答了這個問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非理性的，因為工具理性控制了所有人，人卻不能掙脫它。所以他們雖然強烈地批判了工具理性，卻也掉入了理論困境，亦即找不到解放的可能，人必須活在韋伯比喻的鐵牢

籠中。哈伯瑪斯批判了這種理性的不對稱發展，但他也堅持已經傳統化的「進步」(Fortschritt) 概念，認為在完整的理性化中，有實現「進步」的可能 (Dubiel, 2001; Roderick, 1989)。對上述三個理論傳統而言，工具理性的可計算性特質在實踐上發揮了強大的效用，成為壓倒性的價值 (雖然後果卻不見得有相對的價值)，但貝克卻根據現代化的風險 (正確地說，是我們日常實踐的風險意識) 從工具理性的內部顛覆它，因為工具理性並不如人類原來預期的，可以符合「精確計算」的要求，貝克稱此為「確定性許諾的失敗」(das Versagen der versprochenen Sicherheit) (Beck, 1993: 40)。由此，他要求一個「反思的科學化」(reflexive Verwissenschaftlichung)，而這整個的計畫稱為「現代的現代化」(Modernisierung der Moderne) 或是「反思的現代化」。

伍、貝克的解決方案：「次政治」

貝克爭取一個「典範的轉移」(Beck, 1988: 18-19; Beck, Giddens, & Lash, 1996: 34-36)，但他也知道，光是藉著生態危機的命題無法建立新的社會理論。「風險社會」應當分析當代社會結構的困境，而不只是分析生態問題。他必須證明，工業社會已經到了另一階段。

一、工業社會與風險社會的區別

貝克認為，現代社會不僅是工業社會，還是「風險社會」，他以下列的論證來區分這兩者 (Beck, 1993: 40-45)：⁷

⁷ 前面的論證中已經提及貝克區分「風險社會」與「現代社會」，但貝克在此又說明「風險社會」與「工業社會」之別，是否有重複或相抵觸之嫌，他並未多加說明。

1. 工業社會中，威脅與不確定性被以不同的方式認知：傳統社會中，大自然的危險不會透過「決定」而解除，但可以歸咎於無法掌握的自然力、鬼神；而在工業社會中，「決定」則可以消除危險狀態，當作一種「確定性的承諾」(Sicherheitsversprechen)，所以佔有重要地位。風險社會則出現在確定性的承諾已經失敗的狀況下，連帶地使政治的正當性也受到削弱。
2. 因為既存的規範系統已經失效，所以風險社會的問題就是，由決定所產生的危險應如何被控制？
3. 當規範系統失效，不只是對危險的控制，還有「可控制性」都受到質疑。政治方面受到的威脅是，對於控制與理性的要求因為災難性的結果出現，持續受到反駁。貝克宣稱這是風險社會的先兆，顯示它和其他時代的不同。
4. 對於結果與危險的文化認知差異之排除（現代化風險的普遍傾向）也要考慮：理性與控制承諾之間的矛盾，以及其實際上、原則上的損害，一再喚醒公眾的記憶，同時也反對制度化的排他性同盟以及官僚。簡單地說，理性的規範系統用自己的權威與實踐力消除了自己的根基。
5. 最後貝克提出了一個區分時代的標準：當一個社會所決定生產的危險跨過了可保證 (Versicherbarkeit) 的界線，就表示這社會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換言之，風險社會的指標是私人確定性的保障和工業科技計畫之可確定性的缺乏。

貝克描繪的風險社會圖像似乎顯得未來沒有希望，因為我們可以發現，人類生存在危險的情境中，他們無法控制大宇宙，連私人小宇宙都無法掌握。但貝克如何證明，今日的世界比起以前的時

代顯得更危險或更具風險？⁸ 事實上，沒有一個標準可以比較所有時代的「不確定性」。貝克所謂的「不確定性」其實是「風險意識」(Risikobewußtsein)，是一個反思的結果。「風險意識」使我們沈重地認知到生活中不確定性的威脅，而這些威脅基本上應當可以藉助科學與技術(即工具理性)根除。這裡最重要的是「反思性」這個概念，貝克以「社會風險後果的自我面對」(Selbstkonfrontation mit risikogesellschaftlichen Folgen)來定義，而「反省」(Reflexion)則有科學進步的意義(劉維公，2001: 7)。

風險社會中，我們要面對三個相關領域：其一，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文化資源之間的關係。我們的存在建立在這些資源上，但它們卻因為現代化而逐漸消失；其二，社會與由工業化生產出來的危害與問題，它們超過了社會安全觀念的基礎，動搖了至今對社會秩序的基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內集體或特定群體的意義源泉不斷消耗、除魔化，導致個人必須負擔定義的問題，也就是所謂「個人主義化過程」(Individualisierungsprozeß)(Beck, 1993: 35-39)。所謂「反思的現代化」(或是第二現代)理論就從面對這三個領域開展出來。

二、社會學的重建

「不想要的」、「不可預見的」及「強迫的」現代化後果壓迫古典社會學——貝克稱為「簡單現代化的社會學」(einfache Modernisierungssoziologie)——檢討自己的基本假設，因為下述這些陳舊的假設都無法分析風險社會真實的境況(Beck, 1993: 72-75):⁹

⁸ 另一位第二現代的理論家——英國的紀登士——則有相反的看法：今日的世界比起從前，既不特別危險，也不特別具有風險(紀登士，2001: 24-38)。

⁹ 在這三個基本前提下，「理性化」同時代表(技術的)「反思」。

1. 生活處境與生命歷程都在階級中組織，可以在社會學中化爲圖像。社會不平等的動力都在可清楚劃分的、政治上有凝聚力或相衝突的大群體範疇內解釋。
2. 傳統世界的消失被描述爲一個革命性的過程，這過程若非是開放的、爆炸性的，則是長期的、流出的。秩序在社會學中被認定是次系統的功能分化。
3. 次系統由自己的規則支配，簡單現代 (einfache Moderne) 的運動定律是多樣的，但線性、單向度的理性化過程，是系統分殊化的工具理性之提升與開展。

自從簡單現代由於自己的副作用而改變後，貝克要求爲「反思的現代化」建立一個新的社會學基礎，一個沒有命定論或目的論印記的新理論，既不堅持進步信仰，也不導向衰亡的過程。這將是一個由「不想要的」、「透過表面上自明的真理（正常的、自我推動的現代化）之現代工業社會的瓦解與交替」爲基礎的理論 (Beck, 1993: 75-77)。這樣的理論可在三個方面區分「簡單現代化」的理論 (Beck, 1993: 77-80; Beck, Giddens, & Lash, 1996: 45-50)：

1. 反思的現代化瓦解了社會階級的文化前提，代之以社會不平等的個人主義化形式。
2. 功能分化的問題將代之以功能協調、網絡化、校準、綜合等問題。也就是說，功能分化產出根本性的問題，卻無法解決它們。
3. 簡單現代化的線性理性提升概念有雙重的意義：它是描述與規範的模型。這在反思的現代化已遭到質疑。¹⁰

¹⁰ 所謂古典現代化理論的規範部分，貝克意指帕森思的觀念與他的進化普遍性理論，還有查夫 (Wolfgang Zapf) 的基礎制度 (現代社會之能適應的、能生存的發明)。

就從這三個區別出發，貝克開展了反思性現代化的社會學，他的目標不是「風險社會學」，而是「風險社會的社會學」。本研究有興趣的是當中的規範理論，要探查貝克如何打破科學與技術的理性壟斷。

三、次政治與全球化 (Globalisierung)

正如貝克所描述，風險是由或然率計算解釋，現實上不確定、不可預見、不可控制。因此，科學理性在反思的現代化中並非唯一解決問題的關鍵。「理性」對貝克來說，與科技的進步或價值方面的進步無關，因為他質疑與理性相關的「進步」觀念，所以尋找某一種價值理性也不是貝克式規範社會學的基礎，他轉而求助於從階級與階層中解放出來的「個人」，亦即貝克所稱的「個人主義化」現象。

個人主義化是以某種方式強迫個人接受的變革過程，正如反思的現代化將工業社會轉變為「風險社會」。所以，個人主義化不一定是人類的解放，反而是從大群體脫離出來的個人又踏入新結合關係的風險性生活實踐：大量失業、新貧窮、家庭的瓦解等等。但也在個人主義化的過程中，貝克見到了主動的個人可以成為一個新形式的政治（他稱為「次政治」）的推動力。

「次政治」得自貝克的經驗觀察，並有一個前提，亦即現存的政治系統——他稱為「承載符號的政治制度世界」(die Welt der symbolträchtigen politischen Institutionen)——已經失靈。在政治系統外還有一個政治世界，貝克稱為「政治日常實踐的世界」(die Welt der politischen Alltagspraxis)。「政治」與「次政治」恰好是工業現代與反思性現代的政治結構 (Beck, 1993: 155)。

貝克認為第一個世界將政治等同於國家與政治系統，這個系統

中的決策通常由政黨設定的上層結構引導，亦即古典代議民主的理念型 (Idealtypus)，但代議民主在政治的日常實踐上已經過度負荷。貝克宣稱，既存的政治系統忽略了兩個事實：第一，國家機構面對著社會各層面行為者的活動能量，其實已經動彈不得了，也就是說政治領域的自我組織被忽視了；第二，代議民主已經老化，不能滿足風險社會對政治的實際要求，政治體系與實際的歷史政治境況好像是兩個時代 (Beck, 1993: 155-156)。

在次政治中，決策是由下而上，由自我組織的公民發動、準備，¹¹ 貝克稱這為「存在的個人對抗系統的起義」，也就是「個人的回歸」(Rückkehr der Individuen) (Beck, 1993: 157-158)。因此，政治科學必須重新思索政治的概念：第一是政治社群 (Polity) 的概念；第二是政策 (Policy) 的概念；第三則是權力分配、權力地位的政治鬥爭過程，即政治 (Politics) 的概念。「次政治」可以和傳統的「政治」區別，因為行動者在政治系統之外踏上了塑造社會的舞台。而且，不只是集體的行為者相互競爭，個體的行動者也相互競爭形塑政治的權力 (Beck, 1993: 162-163)。

次政治的命題是貝克規範性政治理論的宣言，接下來他把反思的現代化理論提高到全球化的層次。個人主義化與全球化的關連在於，現代化的風險在全球層面上一般化了，經濟危機、政治危機或生態危機的傳佈沒有國界，因此我們必須把風險社會放在全球化的脈絡中觀察。有趣的是，貝克表現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的傾向，可以和韋伯的文化研究放在一起考察。

在《自由或資本主義》(*Freiheit oder Kapitalismus*) 裡，貝克要求一種普世主義 (Kosmopolitismus)，以便和「全球主義」

¹¹ 明顯地透過社會運動：反戰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等等，在外交、內政、環境與科技政策都發揮了影響力 (Beck, 1993: 164-165)。

(Globalismus) 區別，後者是出自市場理性的非政治形式。其危險之處在於它是一種世界資本主義的政治形式，而且會把第一現代裡市場、民族國家、民主的集合在世界社會中瓦解掉。貝克論證道，全球主義是世界市場支配的意識型態，他把全球主義等同於全球化的單一經濟面向，並用世界市場的獨裁來稱呼 (Beck & Willms, 2000: 116, 246, 257)。

相對地，普世主義從帝國式的普遍主義 (imperial Universalismus) 解放出來，為第二現代的中心基礎——多樣性 (Vielfalt)——開放。為了多樣性，不應只有一種資本主義、一種現代，而是多種的資本主義、多種的現代 (Beck & Willms, 2000: 69, 247)。

和哈伯瑪斯比起來，普世主義的多樣性概念更接近韋伯，因為貝克認為，普遍主義的錯誤在於社會學從一誕生就把自己文化的經驗塑造為理論概念 (雖然這也是最初這個學科成功的原因) (Beck & Willms, 2000: 11)。他的態度有多元主義的傾向，反對相信單一真理的普遍主義。哈伯瑪斯正是普遍主義觀點的擁護者，而韋伯質疑單元論的普遍主義，並求助於不同文化的價值理性，試圖找出西方理性主義之外的選擇。當哈伯瑪斯以古典的西方啟蒙思想回答韋伯的問題，貝克又回到了韋伯的策略。¹² 這是一個有趣的轉折，因為哈伯瑪斯已經把韋伯對理性化的懷疑態度用一個不同的理性概念轉為肯定，貝克又將這個立場轉回一種懷疑的，但卻含蓄樂觀的態度。為了進一步探究貝克的規範社會學，以下將從三個方向去檢討貝克的理論：他的方法論立場、工具理性批判、最後還有他的「反思的現代化」。

¹² 所謂「韋伯的策略」，本文意指尋找多樣的價值理性的可能。有關韋伯尋求解決理性化難題的策略，參見Hu (2004: 26-34, 41-43)。

陸、討論

一、貝克的方法論立場

多德 (Nigel Dodd) 正確地評論道，貝克與紀登士在發展他們的規範性社會理論 (反思的現代化) 時，不像韋伯及哈伯瑪斯把普遍的理性當作規範性概念，在理論上論證；也不像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或後現代理論家，不從理論，卻從規範面不相信普遍理性概念與理論之間有關連 (Dodd, 1999: 216-217)。可能的推論是，紀登士與貝克把他們的普遍主義以實用主義的方式建構。也就是說，兩位第二現代的理論家不在哲學的、超驗的前提下建構他們的理論，反倒注重引發實際的效用，而非理論邏輯上的完滿。這對紀登士來說，不代表在理論建構中放棄方法論的探究。事實上，他早期花了很多功夫鑽研社會學方法論，¹³ 而貝克卻沒有這個階段。他的理論中沒有哲學的相關討論，所以也不需花篇幅解決方法論前提的內在矛盾 (但這不代表理論不會有矛盾)，而規範前提的矛盾正是韋伯、古典批判理論、哈伯瑪斯所遭遇的。¹⁴

換句話說，貝克不是將理論的內在矛盾嘗試以綜合的方式消除，而是根本繞過這個問題。他的目標僅是將現代化的後果清楚闡明，並找出解答，而不是將現代化的整個歷史做哲學、目的論的詮釋，這或許可以將他的方法論立場稱為「實用主義式的」(pragmatisch)。多德卻認為，這或許是個比較恰當的策略，藉助概念、範疇、模型去探討現實，同時解決現代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

¹³ 紀登士的理論建構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大成於一九八四年的《社會的建構》(*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一書。

¹⁴ 韋伯方法論中的新康德主義立場區分實然與應然；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則反對個體與整體的統一；至於哈伯瑪斯，在知識論建構時，思想中的康德傳統與黑格爾傳統也有衝突 (Hu, 2004: 152-154)。

不需要去預言未來，因為理論應當是分析並瞭解現在的工具。馬克思、古典批判理論、哈伯瑪斯的現代社會理論都將現代的歷史發展一般化，不能充分掌握隨機的現代性。將社會理論等同於社會的規範性模型，提倡一個社會未來的發展過程，可能因此錯失它的目標 (Dodd, 1999: 214, 217)。但多德也批評貝克和紀登士：因為全球風險的普遍共識對他們如此重要，以至於不同的觀點（例如某些人認為，溫室效應並不是工業公害造成）以及多元的價值在他們的理論中並沒有多少地位 (Dodd, 1999: 213)。

似乎貝克與後現代主義要接近一點，而與他的德國前輩們要遠一點。「不可知的重返」(Wiederkehr der Ungewißheit) 這個宣言，證明貝克不相信線性進步的理性。他還以相似的方式批評啓蒙的普遍主義驕傲自大：「他們在書桌旁，把自己的真理解釋成普遍的真理。」貝克稱這種態度為「帝國主義」。此外，「對我來說，後現代是啓蒙的啓蒙，當它磨利自己的刀，並鞭打第一次啓蒙的過度要求與普遍主義時，它對我而言就是第二次啓蒙」(Beck & Willms, 2000: 266-269)。因為多樣性概念在第二現代的中心地位，並且是對抗啓蒙之普遍主義的最有力論證，因此貝克有沾染後現代之相對主義的嫌疑。但貝克卻不認為後現代是現代主義的替代選擇，非理性主義不可替代理性主義。對他來說，現代的動力仍和當初一樣，但它的後果卻把我們推到了和啓蒙所許諾的世界相對的方向。於是貝克的哲學立場就顯得相當模糊：從他的工具理性批判來看，他趨近後現代理論家，所以他的觀點似乎是黑格爾式的；但他又反對後現代理論家對於理性的嘲諷，因為沒有工具理性就沒有現代文明，這又像是康德主義的傳統。若說貝克有康德主義的傳統，可是他又反對理性（現代主義）具有普遍的正當性，且他所擁護的價值只是包容的「多樣性」，並非將「理性主義」置於主導的地位。在這方

面，他與哈伯瑪斯相距甚遠，而顯示出一個折衷（或曖昧）的立場。這意味著第三種處境：介於現代和後現代之間，但基本上是現代的、基進的、更新的 (Beck, 1988: 15-16; Dodd, 1999: 185)。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貝克的方法論立場也不清楚，他從未闡述自己的方法，不反對實證主義，卻又非實證主義。對於想建構規範性社會理論的理論家來說，他是一個例外。若他想和盧曼一樣，遵循帕森思的傳統，發展一個一般性理論，那麼他必須與價值判斷保持距離 (Kneer & Nassehi, 2000: 7-9, 11)。或者他該和閔希 (Richard Münch) 一樣，將現代化的後果以「正常性」(Normalität) 的脈絡解釋 (Münch, 2002: 435-441)。若現代社會的病理學是他的主題，則必須在帕森思的傳統之外尋找對抗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基礎 (如哈伯瑪斯或紀登士所做的)，但他都不是。貝克屬於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第三種立場，而他相當程度上已經與後現代妥協。一個可以支持這個論據的證明是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這是接下來的主題。

二、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

有趣的是，在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中，一再浮現他的後現代主義成分。正如他攻擊風險只不過是或然率計算，常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又因科技所引起的災難，所以科學與技術所許諾的確定性已經千瘡百孔。這樣的批評對德國的社會學家來說，是相當不一樣的。從韋伯至哈伯瑪斯，都不攻擊工具理性之可計算性本質上的限度，他們只是對工具理性所展現的技術進步是否合乎理性發出疑問。韋伯屬於二十世紀提出質疑的先驅者之一，他的懷疑態度被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繼承，並朝向否定的方向發展。但哈伯瑪斯和他的前輩不同，認定進步是理性的，也可以在價值理性的意義上謀求進步，我們不應當停止工具理性的進步，而應當尋求另外一個理性的概念，

以平衡不對稱的發展。

貝克卻由另一個方向重塑這個工具理性的問題。他不問進步是否是理性的，而是問在價值理性的意義上，甚至「科技」意義上的「進步」是否存在？這個方向是貝克與他的前輩最不同的地方。

貝克的批評點在於，工具理性之可計算性特質在現實中是不完美的，風險正是「科學理性之非自願的自我反駁」(unfreiwilliger Selbstwiderlegung wissenschaftlicher Rationalität)。風險科學的進步是「科學確定性權威的沒落」(Niedergang wissenschaftlicher Sicherheitsautorität)，因為風險計算可以從完全不同的方向設定，常會有相互矛盾的建議，因此科學的精確性要求無法被滿足 (Beck, 1988: 21)。

這是對工具理性批判最基進的立場，因為它證實了現代科學本質上無法排除錯誤，可說從內部顛覆了工具理性，我們可從韋伯「理性化的吊詭」與貝克「確定性許諾的失敗」兩者本質上的區別來討論。¹⁵ 對韋伯來說，理性化造成的鐵牢籠並不是使用理性原來的目的，因此某種程度上「鐵牢籠」算是理性化的「副作用」，現代社會也因此是 (貝克所稱的)「副作用的社會」，即目的理性的使用出現了始料未及的後果。但是「目的理性」本身是指手段與目的的一致，若是能達到原本預期的目標便算成功，縱使目前科學尚不完美，不見得一定可以完成目標，但是有改善的可能，至少目的理性的膨脹似乎說明了它的成功而非失敗，就像韋伯沒有「風險是科學理性之非自願的自我反駁」的說法，顯示「可計算性」(對韋伯來說)並沒有內在的缺陷。然而，貝克比前輩更瞭解「可計算性」在事實上的限度，而且由於他更注重這方面的事實，所以他可以強調工具理性本質上的缺陷。所謂「確定性許諾的失敗」意思是，科學想利

¹⁵ 「理性化的吊詭」是施路赫特的說法，並非韋伯本人的詞彙。

用數學語言給我們一個「確定」的世界，有別於前科學時代被自然所左右的不確定感。但是我們發現，所謂的「確定」是用「機率」來表示的，但機率只是可能性的大小，「風險」有可能發生，但不能確定何時、何地、甚至不知道是否「一定」發生，仍然是一種未來的不確定，故曰「確定性許諾的失敗」與「不可知的重返」，表示現代社會的人盲目信仰科學，到頭來發現自己繞了一圈回到原點（不確定）。貝克的德國前輩們最在意的是工具理性入侵了「價值」的領域，至於工具理性的可計算性是否完美並非重點，那是他們和貝克的不同。從這個論證，我們對貝克的工具理性批判的說服力必須提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否科學的理性獨斷已經因為自我質疑（亦即不確定性）而基本上被根除了（Beck & Willms, 2000: 278）？葛羅斯（Paul R. Gross）和李維（Norman Levitt）表示，學院左派或是後現代理論家常把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物理學）的研究成果錯誤詮釋，然後推論道，啟蒙式的自然科學（建立在線性因果解釋上的牛頓式科學）已經開始走下坡。最知名的錯誤解釋之一非「渾沌理論」莫屬，對後現代理論家來說，其標榜的「不確定性」、「非線性」、「不可預測性」代表了科學可計算性的失敗，標示了一個「典範的轉移」。而在物理學家看來，這不僅不代表牛頓式自然科學的結束，反而擴大了科學家的視野，提供了更強的因果解釋力，更能帶來「真理」（葛羅斯、李維，2001: 153-171）。似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尚無共識，貝克定義的「反思科學化」也尚未到來。

第二，在《解藥》中，他診斷出「自然與社會的錯誤對立」是現代的病徵（Beck, 1988: 16），這是「風險社會」命題的出發點，也和《啟蒙的辯證》中熟悉的「支配自然」（Beherrschung der Natur）相去不遠。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將這個命題擴大到社會支配的領域，

把人支配自然的關係類比到社會與個人 (Honneth, 1989: 61-68)。貝克並不做這個類比，而是（或許不夠謹慎地）把風險等同於「不確定性」，以「個人主義化」命題的形式擴大到社會行動的領域。許多個人生命歷程中的不確定性可以歸咎於不完美的工具理性，但不是全部。例如可以把尋找伴侶的風險歸咎於科技的失敗嗎？生態危機與人際關係風險二者是否有共同的生產機制？當不確定性和風險在概念上一致時，所有曾出現過的社會形式都是風險社會（每一種社會均存在「不確定」，且階級社會的成員有時也需「單獨」面對生活中的風險）。自古以來，「不確定性」都一直與人共存，¹⁶貝克原來的概念並不是這樣。風險生產與個人主義化過程的出現從「自然與社會的錯誤對立」這個脈絡來看，並沒有理論上的關連。貝克將私人生活與工業生產兩個領域的不確定性都當作「風險」，然後將現代社會冠上了「風險社會」之名。從工具理性批判的觀點，風險概念無法將工具理性做一連貫性批判，因為不是在人生中所有的不確定性都源於人與自然之間的扭曲關係（現代化的風險）。風險社會的命題中，工具理性批判的脈絡是矛盾的。貝克犯的錯誤是，風險概念的擴充正好削弱了他工具理性批判的說服力，或許「反思的現代性」更可以說明他理論建構的中心主旨，而不是「風險社會」。

如上所述，風險概念起初是由工具理性批判的觀點出發，不僅批判人與自然之間的扭曲關係，還想診斷現代化的困境，並尋找解決之道。但引入了個人主義化命題之後，他最初的時代診斷——工具理性引起的危機——反而減低了說服力。相對地，反思性變成了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可以反映出與所有的未知、不確定性一起生活的人性之處境。反思性不必將自己的概念範圍限制在工具理性批

¹⁶ 佛家的「無常」不正是不確定性的最佳註解。

判或是科技風險批判，反而可以擴大到所有現代社會的問題。事實上，人類歷史中每個時代都充滿了未知與不確定，貝克的風險社會想闡明的不過是工具理性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失敗。工具理性在科學、技術、官僚等方面的失靈，要等我們認知到現代社會的危險處境時才被接受。

貝克的理論建構因此分裂為兩個不太相屬的部分：其一為最初的風險社會命題，以風險概念為主的科學主義批判為主軸；第二部分是反思的現代性，從一個擴張的風險概念——不確定性——展開。

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反思性」是一個廣泛的理性概念，不只作用於科學之外，還因為「反思的科學化」作用於工具理性之內。從這個意義來說，貝克的「反思性」是一個隱性的理性概念，它不僅觀察現代的發展過程，還質疑這個過程，但卻不是現代化的推動力 (Dodd, 1999: 185)。

值得注意的是貝克理論中的樂觀源頭：他宣稱科學的理性獨斷已經因為自我質疑 (亦即「不確定性」被認知) 而基本上被根除了。科學的理性壟斷可以被打破，因為貝克利用後現代主義的策略 (利用常被學院左派錯誤解釋的「不確定性」概念) 批判工具理性。不論如何，貝克用這個武器繼續攻擊工具理性本質上的弱點 (有缺陷的可計算性)。相較於哈伯瑪斯的樂觀來自於社會進化的概念 (也是第一次啓蒙的概念) (Hu, 2004: 86-88)，貝克的策略明顯地傾向後現代。縱使如此，貝克反而可以擬定一個規範的社會理論。更準確地說，沒有後現代主義的成分，「反思的現代化」理論對工具理性無法應付自如。接下來的問題是，第二現代的理論說服力可以到什麼程度？

三、「反思的現代化」批判

結構功能論一派的社會學家閔希認為，第二現代理論距離自己的目標——典範轉移——仍然很遠，因他認為第二現代理論出自一個時事評論式的成功時代診斷，且缺乏區分「第一」與「第二」現代的指標 (Münch, 2002: 424-426, 441)。利用什麼樣的結構特徵，使我們可以把一個時代從前一個分開，且兩個時代有相同的變遷動力？閔希試圖發展客觀的檢驗標準。首先是一個風險指標，可以測量日常生活中的實際風險。但貝克的論證中，不僅在科技、經濟生產，甚至個人生活的風險也都找不到這樣的客觀指標。事實上，閔希相信風險生產的提升，例如環境的有毒物質負載增加，從統計數字看不到證據，而且我們正逐步地控制風險。又如私人生活指引 (private Lebensführung) 中的風險 (教育、就業、伴侶)，其實可以看做另一種選擇，能夠擴大個人的行動空間，並提供修正錯誤的機會。所以風險不是升高，反而是降低了 (Münch, 2002: 426-432)。

其次，閔希尋找一個風險意識提高的尺度做為反思性現代化的標記。但這個概念難以用實際的工業化程度來測量：我們是否可以說，因為美國人評估現代科技的風險性較德國人評估得低，所以美國仍處在第一現代？或者是，只有一小部分法國人無效率地抗議遍地的核電廠，所以法國仍是第一現代的社會 (Münch, 2002: 432-434)？

第三個指標是多元性。這個指標的問題是，哪些範疇有多元性的意義？從結社的多樣性來看，美國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大移民潮開始，社團的多樣性就已經超越德國。從這個指標看，美國早就是一個第二現代的社會。但這樣又如何解釋美國人的風險意識比德國人低 (Münch, 2002: 434-435)？

第四個可能的指標是科學、經濟、政治、私人生活指引四個範

疇的結構變遷。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貝克標示的變遷起點——四個領域的結構性變遷不大。於是閔希做出結論：兩個現代之間不存在有意義的區別；分化、制度創新、反思性一直是現代的動力本質，推動社會的進步 (Münch, 2002: 435-441)。

閔希的批評也符合本研究之前提出的觀點，即貝克的風險概念不能維持他理論的連貫。首先，相對於紀登士在《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一書劃分了現代的四個面向，然後依此提出了風險的分類，進一步分析第二現代的秩序問題。這表明了，每個時代都有不同於其他時代的制度 (或結構) 風險，風險並不是這個時代的發明 (Giddens, 1990: 59, 71, 171)。因為缺乏對風險的分類，貝克把由不同原因引起的不確定性都等同於「風險」，但卻沒注意到，不是所有的風險都可以歸咎於工具理性的失敗。¹⁷ 這個原始風險概念的模糊性使得貝克的理論建構分裂成兩部分，因為不是所有的現代化風險都因為「人與自然的錯誤對立」引起。縱使「風險」這個概念本身的說服力也不夠：我們如何證明，現代工業社會比前工業社會更「危險」？因為無法證明第一與第二現代之間出現結構變遷，貝克於是用反思性的概念將風險社會的命題連上第二現代，然後把沒有客觀標準的風險意識做為「反思」的結果，「反思性」其實是兩個分裂部分中間的橋樑。¹⁸

接下來，我們必須討論次政治的規範性意涵。這個命題是由貝克的經驗觀察而來，並沒有政治哲學的根基。如前所述，貝克的社會理論中並沒有內在的哲學立場矛盾，如此他的策略也不是烏托邦

¹⁷ 盧曼的《風險社會學》(*Soziologie des Risikos*) 描繪風險情境 (Risikosituation) 是決定的參與者和受此決定所傷害的相關者之間的鴻溝。在他的觀察中，風險並不一定和科學有關，而是決定。參見Luhmann (1991)。

¹⁸ 在此讓我們回憶貝克的第四個風險命題：在階級與階層關係中，存在決定意識；但在風險社會中，意識決定存在 (Beck, 1986: 31)。

式的(如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次政治的核心概念是「界線消除」(Entgrenzung):科學、經濟、公共領域、政治、私人生活指引等等,所有生活領域的政治化。政策將不僅只是從系統(或是政治機構)單獨決定,系統之外的影響力也很重要。這個設計的目的是要讓脫離控制的風險生產回到適合複雜結構的彈性控制之下,以改善生活(Münch, 2002: 422)。在這個基本構想之下,次政治隱含某種的社會理性,要求與科學理性一起分享改善社會的權力。其次,次政治需要一個溝通倫理,以便實現專家與非專家共同定義風險的理想。從這個觀點來看,次政治是哈伯瑪斯溝通理性的一個應用,同時也遭遇了技術上的問題:高度專業化的語言是否構成溝通的障礙,例如核能專家如何使外行人了解核能的風險計算,並共同定義何謂風險狀態?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排除溝通操縱?經由次政治的過程做的決定可以比既存政治系統做得更好嗎?理想的言談情境提供了一個民主實踐的規範性過程理論,但在現實狀況中並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貝克認為次政治可以當作風險社會中官僚僵化的解藥,這也可以當作韋伯那種無法阻擋的官僚化過程的反論證。因此,次政治可以視為政治理性化的一個新政治形式。

另外,我們也可從當中找到一個貝克傾向韋伯的證據:相對於工具理性,貝克提出了一個「風險理性」,要求我們應該未雨綢繆,因為不可見的、受到忽視的事物可能在未來有重要意義(Beck, 1988: 147)。當然,貝克是否把風險理性當成工具理性的替代概念,還是一個問題,但這也顯示出某種形式的「責任倫理」——基於未來可能出現的危險,我們應該考慮一下今日決策的後果(或副作用)。¹⁹ 韋伯的行動準則在二十世紀末因為不同的理由而再度出

¹⁹ 曾提出「責任倫理」的還有哲學家約拿斯(Hans Jonas)。參見顧忠華(2001)、孫治本(2001)。

現，這次不是因為工具理性的成功，而是因為它的失敗。

最後，我們總結貝克理論的優缺點。貝克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建構有關現代社會的理論，基本上這應該是個一般性理論（如紀登士一樣），以便描述現代的開始並分析現在的階段。但貝克仍然離這個目標很遠：「風險」概念是一個不錯的開始，但因為沒有一個分析現代世界的制度結構（如紀登士一般），無法辨別現代風險的種類，只籠統地將「風險」的生產機制都歸於工具理性在科學、技術、官僚方面的失敗，並用「不確定性」代換「風險」，以至於我們（常錯誤）認為貝克將工業污染當作現代社會（風險社會）與過去社會（非風險社會）最大的不同；再者，我們找不到一個客觀的指標衡量風險意識，²⁰ 因此無法區分「風險社會」與「非風險社會」。

第二，新的政治形式——次政治——必須以理想的溝通情境為前提。不可否認的是，「次政治」在過去二、三十年間獲得不少成功，對許多重大決策發揮影響，然而這個規範性政治過程的設計仍太理想化，理由是：一方面貝克不承諾第二現代是一個「進步」的社會，次政治只是一個實用的權力工具；其次，次政治缺乏一個過程理論。所以從這個意義上，次政治並非規範理論，因為政治決策的應然過程在次政治的理論建構中並沒有說明清楚。

第三，必須說明有關價值理性的問題：所謂「社會理性」、「風險理性」、「反思性」都可以是價值理性的形式。當中，「反思性」是第二現代的核心概念，但我們無法確定它是否為一個價值理性的概念。「反思性」隱含了一個規範意義，亦即人應當以它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但它卻更多是人類今日處境的描述：面對自己。貝克並

²⁰ 貝克用「風險意識」取代「風險程度」當作分類指標，是閔希的見解，因為貝克無法說明現代社會的客觀風險程度如何高於過去的「非風險社會」。本文贊成閔希的看法。

沒有發展前兩個概念——「社會理性」與「風險理性」，但它們卻帶有價值理性的弦外之音。社會理性可以是工具理性的相對概念，哈伯瑪斯正是利用「另一種理性」的策略，解決現代世界的困境。至於風險理性最接近韋伯的責任倫理，要求我們應當考慮決策的後果。嚴格來說，責任倫理和風險理性都不是價值理性，它們比較像行動準則，帶有工具理性的色彩（亦即要求可計算性）。

最後總結貝克的整個規範性社會理論。「反思的現代化」理論留有相當多的縫隙，不是當中的每個元素都恰當地結合在一起。在他的理論中，沒有規範原則的相互衝突，道德立場之間也沒有辯證的關係。至於我們應該追求何種價值，也不是他的重點。相對於此，貝克發展了一些策略，能夠讓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針對價值理性的態度、他對生活風格之多樣性的辯護，顯示了啓蒙思想從哈伯瑪斯到韋伯的後退。韋伯懷疑，是否有一個普遍有效的理性主義；貝克則認為，這樣的理性主義在現代中並沒有必要。相當程度上，他代表了一種樂觀態度，但又不屬於啓蒙的進步觀念。

柒、結論

從理性化問題的脈絡來觀察，「反思的現代化」是二十世紀德國社會學界對韋伯問題的最後一個回答。貝克的計畫從一個時代診斷（風險分析）出發，宣稱人類處於由工具理性引起的全球風險狀態中，這個狀態恰好解釋了工具理性的失敗。這個觀點使貝克很不同於其他的工具理性批判者（從韋伯、古典批判理論、到哈伯瑪斯）——他們當中無人認為，可計算性做為一種「目的理性」在現實中會造成對自身的否定。他們還一致認為，由於工具理性沒有夠大的制衡力量，人性若屈從其下將導致文明危機。貝克也有一個關於文明危機的理論，但他所指的不是人性危機，而是物質文明的危

機，這是一個有關理性化命題的新角度。另一方面，由於這個文明危機，貝克要求在社會學領域內進行「典範轉移」。但如我們所見，貝克的現代風險分析出現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亦即把「風險」和「不確定性」劃上等號。如此一來的问题是，首先，現代化風險（包含個人生涯中的機會選擇）不能全部歸咎於工具理性的失敗；其次，歷史上所有的社會形式都將是風險社會，貝克最初的觀點將這個風險的特質解釋得很清楚，但在私人生活指引的領域（例如交友、擇偶、選擇職業、養兒育女），科學、技術、官僚機構失靈所導致的風險不見得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第三，工具理性與個人主義化之間到底有何關連，貝克並沒有解釋清楚：是否工具理性的擴張引發個人主義化，而且科學、技術、官僚領域如何危害私人生活指引？假若階級與階層的瓦解是一個事實，但這個現象如何與工具理性的失靈扯上關係？更糟的是，將風險的概念由生態危機擴張到其他的生活領域，反而削弱了貝克批判工具理性的說服力，擴大的風險批判反而不能當作邏輯相一致的工具理性批判。此外，如閔希所顯示的，「風險社會」與「反思的現代化」並不能成為分析現代世界的新的社會學概念，因為我們找不到客觀的指標，用來區分第一與第二現代。

但貝克對此視而不見，在次政治命題上繼續發展他的規範性理論，從階級與階層解放出來的個人將可以取代既存的政治系統。當「界線消除」是次政治的核心概念時，「次政治」必須以理想的溝通情境做前提，以便相關者一起討論，共同做出決策。但正如其他學者批評哈伯瑪斯一樣，「理想的溝通情境」是個烏托邦式的前提。貝克迴避了烏托邦主義的嫌疑，因為他並不承諾社會的進步性演化。而更重要的，或許是因為次政治只是出自他實際經驗觀察的命題，不是民主的規範性過程理論，不是哈伯瑪斯式的溝通行動理論。

現在的問題是，「反思性」能否當作一種價值理性。因為貝克不將「反思性」做規範性的定義，似乎他並不處理「價值理性」的問題。另一個可能是，「風險理性」或許可以和韋伯的「責任倫理」相比較，當作一種行動準則。這樣的策略使他和韋伯的方法更接近一些；在韋伯的想法中，從價值理性觀點出發的普遍有效理性主義尚未見到，因為他將西方理性主義的效力劃上問號 (Hu, 2004: 35-37)，故他只能建議一種「行動準則」。他並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性的規範政治理論，因為政治領域在他眼裡是「諸神的競技場」。貝克卻是一個「多樣性」的熱誠捍衛者，他和韋伯的共同點是立場上的相對主義傾向，因此二者都無法提出一個普遍主義的價值理性理論。²¹ 另一方面，韋伯和貝克在立場上也有差距：面對實際上價值的爭辯，韋伯遲疑著要不要接受西方理性主義的普遍效力 (Benhabib, 1992; Dodd, 1999: 52-53)；貝克則接受現實：不存在普遍有效的價值理性，並毫不猶豫地放棄西方理性主義的「正確性要求」(Richtigkeitsanspruch)。

最後是貝克的樂觀主義傾向。和哈伯瑪斯不同，貝克的樂觀不來自於對進步的信仰，而是來自他帶有後現代主義工具理性批判的風險分析，認為科學無法提供確定性。雖然這樣的批判有誤解現代物理學研究成果的嫌疑，自然科學家也不認為自然科學的數學式可計算性受到威脅，貝克還是可以完成他樂觀的「第二現代」理論。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貝克的理論呈現了現代和後現代的混合：貝克宣稱他不是後現代主義者，沒有所謂現代的終結，極端的相對主義並不是現代化之外的正確選擇。但沒有後現代主義的元素，貝克

²¹ 貝克不贊成後現代式的相對主義，但他卻擁護「多樣性」，這使我們想起韋伯所謂的「諸神的鬥爭」，但卻和平得多。他不從啟蒙的脈絡去解決現代化的困境，如此也更接近韋伯，像他一樣建構「行動準則」式的規範策略(兩種倫理)，試圖用「風險理性」取代「目的理性」。

也不可能成功批判工具理性，後現代主義的元素甚至是「反思的現代化」理論的基礎結構。不過這個混合式的理論仍然很零碎，例如個人主義化與工具理性的失靈之間缺乏理論關連，就可以顯示貝克的第二現代只是個經驗觀察建構的命題，尚未成爲一個已經系統化的規範性理論。

參考文獻

- 紀登士 (A. Giddens) (2001)。《失控的世界：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省思》(陳其邁譯)。台北：時報文化。
- 施路赫特 (W. Schluchter) (1986)。《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台北：聯經。
- 孫治本 (2001)。〈個人主義與第二現代〉，顧忠華 (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頁 99-126。台北：巨流。
- 葛羅斯、李維 (P. R. Gross & N. Levitt) (2001)。《高級迷信》(陳瑞麟、薛清江譯)。台北：新新聞。
- 劉維公 (2001)。〈第二現代理論：介紹貝克與季登斯的現代性分析〉。顧忠華 (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頁 1-15。台北：巨流。
- 顧忠華 (1994)。《韋伯學說新探》。台北：唐山。
- 顧忠華 (2001)。〈風險、社會與倫理〉，顧忠華 (編)，《第二現代：風險社會的出路？》，頁 17-45。台北：巨流。
- Beck, U. (1986).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Beck, U. (1988). *Gegengifte: Die 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Beck, U. (1993). *Die Erfindung des Politischen*.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6). *Reflexive Modernisierung: Eine Kontroverse*.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Beck, U., & Willms, J. (2000). *Freiheit oder Kapitalismus: Ulrich Beck im Gespräch mit Johannes Willms*.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Benhabib, S. (1992). *Situating the self*.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ttomore, T. (2002).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its critics*. London, UK &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odd, N. (1999).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Dubiel, H. (2001). *Kritische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Eine einführende Rekonstruktion von den Anfängen im Horkheimer-Kreis bis*

- Habermas* (3. Aufl.). Weinheim/München, Deutschland: Juventa.
- Endreß, M. (1998). Max Weber zwischen Immanuel Kant und Jürgen Habermas: Kontexte und Probleme der Unterscheidung von Gesinnungs- und Verantwortungsethik. In A. Bienfait & G. Wagner (Hg.), *Verantwortliches Handeln in gesellschaftlichen Ordnungen. Beiträge zu Wolfgang Schluchters Religion und Lebensführung* (S. 35-68).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London, UK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UK: Polity.
- Habermas, J. (1987).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2 Bde.) (4. durchgesehene Aufl.).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Honneth, A. (1989). *Kritik der Macht: 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Horkheimer, M., & Adorno, T. W. (2002).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Limitierte Jubiläumsedition).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Fischer.
- Hu, C. K. (2004). *Die Zählung der Zweckrationalitä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es 20. Jahrhunderts: Die Rationalisierungsproblematik bei Weber, Horkheimer/Adorno, Habermas und Beck*.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 im Breisgau, Freiburg, Deutschland.
- Kaesler, D. (1998). *Max Weber: Eine Einführung in Leben, Werk und Wirkung* (2. durchgesehene Aufl.).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 New York, NY: Campus.
- Kneer, G., & Nassehi, A. (2000). *Niklas Luhmanns Theorie sozialer Systeme: Eine Einführung* (4. unveränd. Aufl.). München, Deutschland: Fink.
- Luhmann, N. (1991). *Soziologie des Risikos*. Berlin, Deutschland: Gruyter.
- Münch, R. (2002). Die "Zweite Moderne": Realität oder Fiktion? Kritische Fragen an die Theorie der reflexiven "Modernisierung",

-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54, 3: 417-443.
- Schischkoff, G. (Hg.) (1991). *Philosophisches Wörterbuch* (22. Aufl.). Stuttgart, Deutschland: Kroner.
- Roderick, R. (1989). *Habermas und das Problem der Rationalität: Eine Werkmonographie*. Hamburg, Deutschland: Argument.
- Schluchter, W. (1980). *Rationalismus der Weltbeherrschung: Studien zu Max Weber*. Frankfurt a. M., Deutschland: Suhrkamp.
- Weber, M. (1980).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4 Aufl.). Tübingen, Deutschland: J. C. B. Mohr.
- Weber, M. (1988).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7 Aufl.). Tübingen, Deutschland: J. C. B. Mohr.

Questioning Ulrich Beck's "Second Modernity": A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ritique

Cheng-kuang Hu

Abstrac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Risk Society*, Ulrich Beck has become one of Germany's leading sociologists. Now, many social scientists—including Beck, Giddens and Lash—in many different fields, are flocking together to conduct their research under the motto of "second modernity": a new sociological paradigm through which they seek to escape the controversies troubling "modern" and "post-modern" theories. This study concerns the other aspect of Beck's theory: the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ich is also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 thesis of the risk society.

In this way we discover a fundamental problem in Beck's work. At the beginning he ascribes modern risks to the failur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ut since he cannot find any objective criterion to prove that modern life is riskier than the earlier ones, there is consequently no epoch of "second modernity." And when he identifies "risk" with "uncertainty," all societies in the human history must be considered "risk societies."

On the other hand, Beck could not tam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ithout components of the "post-modern" theories in his thesis, which is among the most progressive attempt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rationalization. Finally, Beck's normative strategy seems to be like that of Max Weber, who employs a "*Handlungsmaxime*" instead of a value system for which we should be searching. But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Beck holds a more optimistic standpoint in contrast to Weber.

Key Words: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second modernity, rationalization, subpolitics